

# 国内外亚里士多德修辞思想研究综述

——兼评国内关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误解

赖玉英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 古典修辞理论历来是当代西方修辞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外对亚里士多德修辞思想的研究进行广泛而深刻的讨论, 重视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内对亚氏修辞思想的重新阐释。而国内学者除了对亚氏修辞学个别重要概念的阐释, 主要表现为对“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修辞批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他们倾向于认为“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是当代西方修辞研究的基础, 这是一个误解。弄清亚氏修辞思想在当代的流通情况并消除这一误解, 不仅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当代西方修辞的认识, 而且对我们建设现代修辞学科也不无启发意义。

**【关键词】** 亚里士多德; 西方修辞; “新亚里士多德主义”; 修辞批评; 新修辞

**【中图分类号】** H3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0292(2017)02-0100-03

## 一、国内外亚里士多德修辞思想研究概述

从19世纪中叶以来, 亚氏修辞思想受到广泛的研究和持久而热烈的讨论。根据著名的修辞史学家 George Kennedy 《修辞学》最新译本<sup>[1](P321-330)</sup>的文献统计, 我们可以窥视到西方亚氏修辞思想研究的盛况: 从时间跨度上看, 西方修辞学界从1929年开始就对亚氏修辞理论进行较为深入研究, 到2007年肯尼迪发表该译本前夕已经取得许多重要成果; 从数量上看, 以“亚里士多德”为主题、与亚氏修辞学相关的专著和编著达36本, 其中, 专门讨论亚氏《修辞学》及其修辞思想的著作达21本, 如埃里克森编著的《亚里士多德: 修辞学的珍贵遗产》(Erickson, 1974)、尤金·莱恩的专著《亚里士多德的修辞论辩理论》(Ryan, 1984)和罗蒂编著的《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研究论文集》(Rorty, 1996)。从另一个角度看, 国际五大著名的修辞理论期刊——《修辞学刊》《修辞评论》《论辩》《哲学与修辞学》《修辞学会季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的亚氏研究论文达176篇, 其中, 2006年以来以“Aristotle”或“Aristotelian”为标题的专论达43篇。这些研究

的主要方向如下: 首先, 在当代语境下重新解读亚氏修辞理论中的主要概念如 logos, enthymeme, pathos/emotion, ethos/character, audience; 其次, 重视与伊索克拉底、西塞罗、阿那克西米尼等经典作家有关的某些修辞概念、理论和方法的对比研究; 最后, 修辞学界越来越关注亚氏修辞理论与当代论辩理论的关系。可见, 亚氏修辞学的历史地位和当代意义是研究的焦点。

国内有关西方修辞学和亚氏修辞理论的译介和研究直至20世纪末才徐徐拉开帷幕。从近十年的成果来看, 国内对亚氏修辞思想的兴趣表现在: 一方面, 从亚氏《修辞学》中修辞的定义、修辞与辩证的关系、修辞学的关键概念如“话题”“修辞推论”“三大诉诸”等介绍亚氏的修辞思想或从新旧修辞学的对比揭示当代修辞理论与亚氏修辞学的联系, 提出伯克和亚氏的修辞理论不仅从定义、功能和范畴上看有“血脉关联”<sup>[2](P45-51)</sup>, 他们在运作机制上也有联系<sup>[3](P45-50)</sup>等。另一方面, 关注“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以下简称“新亚”), 认为它是当代西方修辞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与国外相关研究显然不同。袁影将“新亚”与伯克戏剧五范畴等批评模式相对比, 认为它“由‘觅材取材’‘安

**【收稿日期】** 2017-02-15

**【作者简介】** 赖玉英, 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西方修辞学、话语与修辞。

排‘风格’‘记忆’‘演说方式’”等修辞学范畴构成，以“修辞发明”为核心范畴，具有“本位性鲜明、可操作性强”等优点<sup>[4](P32-136)</sup>。柴改英、郦青在其专著《当代西方修辞批评研究》的第二章专门讨论新亚修辞批评。在简单地构筑古典修辞的兴盛、衰落和复兴史之后，作者指出：“新亚修辞批评可以从重构修辞情景、解构修辞文本和评估修辞效果三个方面展开”；解构文本主要着眼于修辞“五艺”，即通过三个诉求觅材取材、谋篇布局、风格、记忆和演讲的发表；评估演讲效果则从受众的反应、大众传媒的报道、现场采访等方面来考察<sup>[5](P30-35)</sup>。在勾勒出“新亚”理论之后，他们将这一方法应用于奥巴马总统就职演讲的批评实践中，分析奥巴马如何通过各种资源取得预期的修辞效果。国内最早的“新亚”修辞批评实践可以追溯到郑庆和于2001年发表在《修辞学习》的《重读苏秦与张仪——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修辞批评之尝试》一文<sup>[6](P10-11)</sup>。直至近期，该修辞批评在国内依然受到广泛的应用和传播（徐娇娇，2011；郑兰，2014；史小静，2015；林兵，姜亭亭，2016；李波，2016）。

## 二、国内关于“新亚”的误解及其缘由

国内学界之所以如此关注“新亚”修辞批评，是因为存在一个误解，即认为“新亚”是当代西方亚氏修辞研究的主流，是当代修辞学的基础。例如，李建军在谈到 Donald Bryant、Lloyd Bitzer、Kenneth Burke 等人对20世纪50年代修辞复兴的“卓越努力”时，将他们的理论归入“实用主义批评的现代新亚里斯多德主义修辞理论”，认为他们“都直接继承了亚里斯多德关于修辞的基本观点”<sup>[7](P58)</sup>。这是一种非常“武断”<sup>[8](P13)</sup>的做法。然而，李建军绝不是另类。国内许多学者倾向于认为布斯、伯克、帕尔曼等当代西方修辞理论家都是“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在他们看来，“新修辞学”几乎等同于“新亚里士多德学”。柴改英、郦青把韦恩·布斯称作“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是“新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中坚人物”<sup>[5](P189-191)</sup>。甚至国内学者温科学也对伯克做出这样一番评述：“伯克的研究是亚里斯多德修辞学的延伸，不管是把伯克的修辞学思想称为‘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还是‘新修辞学’，他……对西方修辞学在20世纪的复兴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sup>[9](P150)</sup>几位学者的论述内化了这样的认定：伯克等当代西方修辞学

家继承了亚氏修辞思想，因此，他们都是“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因而当代修辞理论都可以归入“新亚”或者说“新亚”是当代修辞学的基础。

学界产生“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是当代修辞学的基础”的印象并不是空穴来风。我们发现李建军、柴改英和郦青关于“新亚”的描述来自《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1998）一书<sup>[10]</sup>。该书按20世纪修辞学发展的“史的线索”分为三个部分：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修辞学、新修辞学—过渡期和新修辞学—发展期。按照常昌富的概述和他们在这本译著上的安排，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将20世纪西方修辞学的发展看成“以演讲为中心的修辞学的复兴运动”，他们所勾勒20世纪修辞学的发展史完全可以被看作“新亚”修辞批评的盛衰史，特别是把“新修辞”运动的主将 K. Burke 看作“新亚”向“新修辞”过渡的关键人物，使得“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与“新修辞”之间的关系变得暧昧不清。该书的姊妹篇《当代西方修辞学：批评模式与方法》<sup>[11]</sup>则将“新亚”氏修辞批评与戏剧主义修辞批评、社会学修辞批评和后现代主义修辞批评并列为当代主要的修辞批评模式，并提供了经典范例。这两部译著对于“新亚”修辞批评的过分强调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国内学者对亚氏修辞理论在当代西方修辞研究领域流通情况的误解，使人们误以为“新亚”是当代亚氏修辞思想研究、乃至整个西方修辞研究的主流。

## 三、“新亚”与当代西方修辞研究

在西方修辞研究中，“新亚”描述的是一种以“传统的”亚氏修辞学为基础的当代修辞理论或研究方法，其主要特征包括强调修辞话语的类型（庭辩性、审议性和表现性）、论据的分类（诉诸逻辑、诉诸情感和诉诸人格）和修辞的五大任务（发明、谋篇、风格、记忆、发表）；此外，它还关注如何说服特定的受众<sup>[12](P204)</sup>。按照一般的叙事，“新亚”最早兴起于修辞批评领域。1925年，Herbert Wichelns 的《演讲的文学批评》一文“经典性地压缩进了几乎所有亚里斯多德《修辞学》的批评大纲”和古典修辞的五大部门，因而被称为“新亚批评原则”，从此“正式掀开了当代修辞学批评的序幕”<sup>[10](P8)</sup>。此后三十多年，该模式成为修辞研究特别是修辞批评的主流，代表作品有 Thonssen & Baird 的《演

讲批评》、三卷本的《美国公众演讲的历史和评论》。

然而,虽然“新亚”曾在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统治了修辞批评研究的半壁江山,但是它却谈不上对当代修辞理论有什么重大影响。一个最明显的证据是两大著名的修辞学百科全书都没有把“新亚”收入词条<sup>[13][14]</sup>,而只是在评价美国修辞学家 Edwin Black 的贡献时一语带过而已。对于“新亚”,Black 在其成名作《修辞批评——方法研究》<sup>[15](Pxxvii-xviii)</sup>一书中提出严厉的批判,认为它“方法上缺乏多样性、批评家可选的程序不够多、甚而这个主流的修辞批评模式是完全错误的”。美国著名修辞学家 D. Gaonkar 指出,古典修辞提供的那些概念、范畴、法则等在理论上过于“单薄”,难以使批评家在表述和分析当代修辞实践时达到应有的深度、强度、精度和信度<sup>[16](P319)</sup>。在意识到“新亚”的“严重缺陷”之后,Black 等修辞学家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实践领域。他们举起“新修辞”的大旗,主张在研究方法上不受传统修辞学的束缚,不拘一格地吸收各种理论资源、要求将四处扩散的修辞意识固定化、机构化,使之至少成为一门与哲学、文学、社会学并驾齐驱的显学<sup>[16](P315-316)</sup>。从这个角度看,“新亚”显然与当代修辞学的学科定位格格不入,因此,为 Black 等致力于建设当代修辞学科的学者所抛弃。而当代西方公认的两位大修辞学家——Ch. Perelman 和 K. Burke 的修辞思想都横跨了不同学科领域,是不同学科研究成果的融会和综合<sup>[16](P315-321)</sup>。这表明,“跨学科性”是修辞的本质属性,是当代西方修辞研究的基本追求。反过来说,以两千多年前的亚氏修辞理论为基本框架的“新亚”绝不可能是当代西方修辞研究的主流。

#### 四、结语

以上对国外相关文献的梳理表明,“新亚”并没有对当代西方修辞研究和修辞理论建设产生重大的影响,它既不是当前亚氏修辞思想研究也不是当代西方修辞研究的主要倾向。通过追溯“新亚”与西方修辞研究的关系,我们发现机械套用亚氏修辞理论概念、范畴和框架的“新亚”与当代修辞学的学科定位格格不入,因此,早就

为 Black 等致力于建设当代修辞学科的学者所抛弃。把“新亚”看作当代西方修辞研究的主流,完全是一个误解。

#### [参 考 文 献]

- [1] Aristotle. *On Rhetoric: A Theory of Civic Discourse*. Trans. George A. Kenned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2] 邓志勇. 伯克与亚里士多德:差异及“血脉”关联——从修辞学的定义、功能和范畴来看[J]. 修辞学习, 2009(6).
- [3] 邓志勇. 试论伯克修辞学与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在运作机理上的关联[J]. 外国语文, 2011(4).
- [4] 袁影. 修辞批评新模式构建研究[D].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8.
- [5] 柴改英, 郇青. 当代西方修辞批评研究[M].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2.
- [6] 郑庆和. 重读苏秦与张仪——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修辞批评之尝试[J]. 修辞学习, 2001(5).
- [7] 李建军. 论小说修辞的理论基源及定义[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1).
- [8] 汪建峰. 韦恩·布斯与西方文学批评的修辞视角[D]. 福州: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9.
- [9] 温科学. 20世纪西方修辞学理论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 [10] [美]肯尼斯·博克,等. 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M]. 常昌富,顾宝桐,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11] [美]大卫·宁,等. 当代西方修辞学:批评模式与方法[M]. 常昌富,顾宝桐,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12] Babin, Edith and Kimberly Harrison. *Contemporary Composition Studies: A Guide to Theorists & Terms* [M]. Westport, Connecticut and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9.
- [13] Sloane, Thomas O. ed. *Encyclopedia of Rhetoric*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4] Enos, Theresa. ed. *Encyclopedia of Rhetoric and Composition: Communication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Information Age*[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6.
- [15] Black, Edwin. *Rhetorical Criticism: A Study of Method*[M].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5.
- [16] 刘亚猛. 西方修辞学史[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责任编辑 薄 刚]